

论语新编新释

王春华 著

子曰：「君子無小仁者，樂山，樂水，樂人，樂己。」

子曰：「鳥獸，草木，瓦石，子曰：『文，得，人，焉，其，平。』」

子曰：「雁，也，可，使，南，面，也。」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论语新编新释

王春华 著
于联凯 审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新编新释/王春华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210 - 08557 - 7

I. ①论… II. ①王… III. ①儒家②《论语》- 注释
IV. ①B222.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711 号

论语新编新释

作 者:王春华 著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章 雷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网 址:www. jxp-ph. com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31.5

字 数:58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8557 - 7

赣版权登字—01—2016—3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98.00 元

承 印 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于联凯

《论语新编新释》是王春华博士撰写的一部新作,这部书的出版既展示了《论语》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推动《论语》研究的深入发展。

拜读之后,感到这部著作有以下几点成功之处:

一、对《论语》进行重新编纂,符合文献学发展的规律,也符合现当代人思维及阅读的习惯

孔子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经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整理之后,据王充说有“数十百篇”之多(《论衡·正说篇》)。后经战国兵火及秦时焚书的破坏,到汉武帝时,“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同上)这就是说,当时从孔壁出土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出《鲁论》《齐论》各二篇,河间本一种九篇,另一种三十篇(实际上也是九篇,其他是对《论语》的解释)。后经张禹、刘向、刘歆等人的整理,定为二十篇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这说明《论语》二十篇的编纂格局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变化的结果。

至20世纪三十年代,已有学者对《论语》进行重新编纂。

至20世纪四十年代,《论语》研究专家石永楦先生经多年研究出版了《论语正》一书(中华书局2012年5月重版)。该书认为二十篇的编纂格局不符合孔子原意,因而他重编《论语》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知道篇,下篇为问王篇。上篇又分为五章,分别是: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问王篇,分为四章,分别是:正名第六,士耻第七,绝四第八,问王第九。全书共九章。可惜由于多种原因,此书影响并不广泛。

这次王春华博士废寝忘食,殚精竭虑,重编《论语》为五篇,即修身篇、从政治国篇、教育教学篇、处世篇和道德与哲学篇。这既符合《论语》“修己以安人”的固有逻辑,又符合文献学发展的规律,同时也符合现当代人的思维及阅读习惯,必将有利于《论语》的学习与传播。

二、作者对《论语》的诠释有新意

自西汉以来,诠释《论语》几乎成为一门专业,这方面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其中有新意者并不多,大多是相互转抄。这次《论语新编新释》,一方面有分析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有所前进,主要表现为在注释中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孔子思想的价值及历史局限性站在较高的角度,予以分析说明,从而突破了传统的作注释只说明字词意义的做法,给读者以启迪。

例如,对《论语·先进》“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新编1.1.2.21)的注释,即颇有新意。本来,这句一般都诠释为:“子张问善人之道,孔子回答说:‘善人如果不循着前人的脚步走,也不可能达到登堂入室的地步。’”一般注释到此也就为止了。但《论语新编新释》的作者却继续注释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从问题的反面揭示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任何时代新的思想都是从先前的某种思想资料出发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发展得更好更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任何思想文化都是该时代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二、任何新的思想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都是以先前的某种思想资料为基点而形成的;三、一种新思想,往往是同时代的其他某种思想的对立物。我们根据这三点去研究任何时代的思想文化,一般来说,都会得出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结论。而孔子所谓“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结论,确实表达了与第二点相同的认识。因而《论语新编新释》使人们站到了新的高度上,更科学全面地认识了孔子思想的价值。这当然会使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类似情况还有若干,兹不一一列出。

关于孔子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论语新编新释》作者在注释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有分析地说明。例如,在注释“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新编5.2.1.3,原编《里仁》4.16)一段时,作者指出:“这是孔子关于义利关系的名句,而实际上这样的结论有很大的片面性,‘义’与‘利’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孔子之后的荀子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以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为了防止人们因争夺利益而造成混乱,他提出了‘以义制利’的理念,并设计了一套策略,以治理国家。近代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应

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①后来恩格斯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②因此,任何的‘义’都是以一定的利为基础的,义与利是无法完全分开的。坚持和维护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就是凛然大义,危害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就是为非作歹,就是非正义,君子既喻于义,同时也就喻于国之大利。‘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维护国家民族的大利(大义),而仅仅看到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甚至要去损害国家民族之利。”作者这样有分析的论述,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孔子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做也是比较有新意的。类似情况还有若干。

又如,对“天下归仁”的诠释。刘宝楠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言己诚为人,人必知之,故能归仁,己得成名也。”此言,“归仁”即一日归仁名于某某人。又,《黄氏集释》:“天下归仁焉,谓全天下之人将仁名归之于他,即全部都称他仁。”杨伯峻《论语译注》曰:“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

《论语新编新释》的作者认为:“此种解释似乎失之于狭隘。孔子胸襟广阔,常以天下为忧,故仔细体会孔子原意,‘复礼’与‘归仁’并未限定是哪些人,而只是对问题作一般说明。因此,孔子此处所言应指天下任何人或天下所有人,只要能克己复礼,就能达到仁的标准,一旦天下皆能克己复礼,天下就会归于仁的范畴。”应该说作者这样的诠释的确比之以上观点更胜一筹,因而是有创新意义的。

另外,作者在诠释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作者在诠释中涉及《论语》的内在逻辑、“仁”的内涵等重要问题时,阐述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既有新意,但也未必能达到至善至美的程度,所以需要进一步讨论。作者在注释“依于仁”(新编1.2.1.1,原编《述而》7.6)一句时,说:“‘仁’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和哲学范畴,其内涵、外延都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今‘为仁’的要义,就是要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同时在这个过程,要强化修身立德,弘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无私无畏、清正廉洁的正气,处处能为人民群众的表率。”这种说法在过去并不多见,我认为是应该再作深入讨论的。

《论语新编新释》的出版,本身就是一项改革,一项试验,因而其缺点、失误在所难免,如果读者有什么批评意见或不同认识,那将是十分正常的。我相信,经过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同切磋琢磨,《论语新编新释》将会改正其不足之处,变得更加完善成熟,在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以为序。

2016年1月

自序

《论语新编新释》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原编篇、章、节、目的调整，第二部分是对新编内容的诠释。

一、关于《论语》原编篇章节目的调整

《论语》是一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在我国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我国其影响之深远，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部著作可与之相比。然而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其长期通行的二十篇的编纂格局并不能尽如人意。

(一)

人们不难发现《论语》所蕴含的思想本身有着严密的逻辑性，这就是以“修己以安人”为基本内核，然后展开，形成修身齐家，从政治国，教育教学，培育英才；使天下有道，人民安乐，并形成天地鬼神人物和谐相处的现实体系。但是，《论语》二十篇的编纂格局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体系。当然，也应该承认，由于语录体文献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使现在通行的二十篇编纂格局的《论语》在一定程度上或部分地体现了《论语》固有的思想逻辑。

从现行“二十篇”的篇名来看，《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好学修身而后从政治国，然后达到平天下的逻辑。《论语》本身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有“(侨闻)学而后入政”的说法,可见,好学、修身、从政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逻辑思维,也是《论语》固有的逻辑之一。从这一点上看,二十篇的格局,体现了《论语》固有的思想逻辑。

但是,从另一点说,二十篇的篇名,仅与各篇的首章有关,而与其他章无关,这又造成了篇题与其内容的割裂。另外,在二十篇中,大多数篇章在内容安排上,缺少逻辑性,篇与篇之间也缺乏内在联系。

《学而第一》,因首章首句为“子曰‘学而时习之’”,故取“学而”为名,全篇共16章。涉及“学”的仅5章,其中部分章还与其他方面有交叉。其余论修养的有6章,论孝的有4章,论从政治国的有2章,论仁、礼的各1章。虽名“学而”,但“学”并非本篇中心。其他方面与篇题不符,这就影响了全篇的逻辑性。

关于《学而》的编次问题,《皇侃义疏》云:“自《学而》至《尧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无别科,而以《学而》为最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故《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明人必须学乃成。此书既遍该众典以教一切,故以《学而》为先也。”实际上,能够体现皇侃这一见解的在本篇中仅有《学而》的第一章,而其他各章,特别是那些与学无关的章节,是无法体现这一点的。

《为政第二》,全篇共42章。因首章首句为“为政以德”,故名。从内容来看,论述为政及与从政有关的有6章,与教育、学习有关的有6章,论述孝道的有4章,其他评价颜回1章,处世方法2章,用人方法1章,君子2章,修德1章,礼1章,祭祀及义1章。可见,全篇并无中心议题,当然,把《为政》次于《学而》之后是符合逻辑的,已如上述。

《八佾第三》,全篇共26章。因首章首句为“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故取名“八佾”。从内容看,论乐的有7章,论礼的有11章,其他8章论仁德、祭祀、夷狄等。

应该说,本篇以礼乐为中心,兼论其他,逻辑性较强。把《八佾》编次于《为政》之后,皇侃、邢昺皆认为礼乐为从政治国的重要措施,故编次适当,以今观之,只能说大体上是合理的。

《里仁第四》篇名取自首章首句“子曰‘里仁为美’”。全篇26章,其中“子曰”24章,子与曾参对话1章,记子游言论1章。从内容看,论仁的8章,道德修养的6章,论孝的4章,论道的2章,论君子小人的2章,论义、礼、利及处世方法各1章,全篇偏重于论仁,但还不能说以仁为中心论点,因

涉及其他方面的还较多。

另外,《里仁》编次于以论礼乐为主的《八佾》之后,似不合乎孔子的本意。虽然古代的邢昺,近代的钱穆等诸位先贤皆曾为《里仁》次于《八佾》之后寻找理由,但无奈孔子明言“绘事后素”,礼后于仁(《论语·八佾》),所以《里仁》编次于《八佾》之后,也不怎么合乎孔子的思想内在的逻辑。当然,《八佾》也不纯粹是讲礼仪、祭祀的,也有其他内容。今日观之,此种纠结,属于无可无不可之类。

《公冶长第五》,品评自己的弟子及部分其他人物,最后亦论及孔子自己。此篇内容比较集中,体现了孔子在推行“修己安人”的主张时,知人论世的若干状况,总体上符合《论语》的内在逻辑。

《雍也第六》,本篇共30章,前15章是继前篇而来,对诸弟子做出评论,特别是重点评价赞扬了颜回;后15章对其他问题如人性、文质、鬼神、仁智、变革、教学内容、博施济众、中庸等若干问题作阐述,这些问题皆在孔子思想体系之中,但论述时缺乏中心,逻辑不严密。

《述而第七》,本篇主要是通过孔子本人的话,介绍孔子品行、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特点及孔子若干生活起居状态,生态思想等。此篇因以介绍孔子为中心,故内容比较集中,但同样存在篇题与其内容,大部分不相符的问题。

《泰伯第八》,本篇共21章,其中1、18、19、20、21共5章赞美尧、舜、禹、泰伯、文王、武王等古代帝王圣贤的美德懿行。其他共11章记述孔子关于《诗》《书》《礼》《乐》的教化作用,用民的策略,执政的方法等等多方面内容,另有5章记述曾子言论,其中1章是对颜回的赞扬,2章论述君子、士人道德修养,2章记述曾子临终言论。邢昺曰:“此篇论礼让仁孝之德,贤人君子之风,劝学立身,守道为政,叹美正乐,鄙薄小人,遂称尧、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论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载贤圣之德,故以为次也。”从以上对本篇的介绍及邢昺的评述可以看出,本篇内容比较庞杂,似无中心。

《子罕第九》,本篇31章。首章谓“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故以“子罕”为篇题,以下诸章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天道、礼的损益、思想方法(绝四、叩其两端),重实际,改之,绎之为贵等;教学方法,临终关怀,从政、修养、交友以及儒家气象(不可夺志,岁寒松柏)等等。所论如珠玑罗列,可惜缺乏一根串为一体的红线,使人有无章法之憾。

《乡党第十》,本篇名为《乡党》,因首章有“孔子于乡党”之句,故名。实

际记述孔子平日于乡党、朝廷、宗庙之言行举止,乃至生活起居情况,以表明孔子时时处处皆恪守礼仪的美德。但本篇所述并不限于以上内容,还有“康子馈药”1章(《论语》10.16),彰显了孔子的养生意识。“厩焚”(《论语》10.17),彰显了孔子的尊重人性的理念。而“朋友死”1章(《论语》10.22),表明了孔子推己及人的人道观念。而全篇最后1章(《论语》10.27),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孔子赞其:“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表现了孔子希望能把握机遇,有所作为的思想。总之,本篇的内容也不纯粹,篇题“乡党”,很难概括本篇内容及主旨。

《先进第十一》,全篇26章。除首章表现了孔子希望改革世卿世禄用人制度的思想外,其余25章都与其弟子有关。其中有15章(《论语》11.3—11.7,11.13—11.19,11.24—11.26)是对其弟子的评价,另外,专谈颜回死事的有四章,其余是回答弟子问题和对弟子进行施教。从内容来看,涉及许多方面,似无中心。至于为什么在《乡党》之后编入《先进》一篇,邢昺认为:“前篇论夫子在乡党,圣人之行也。此篇论弟子贤人之行,圣贤相次,亦其宜也。”可供参考,篇题为“先进”,除与首章外,与其余各章皆无关系。

《颜渊第十二》,全篇共24章。本篇较多涉及“仁”的问题,有“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和曾子关于“以友辅仁”的论述,总共5章,这5章是《论语》全书中论证“仁”最为集中的篇章之一。除此之外,本篇有“子贡问政”,“哀公问(年饥)于有若”,“齐景公问政”“子张问政”,“季康子问政(共3章)”,共7章。其中齐景公问政时,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其余是诸弟子问君子,问明,问崇德、辨惑,问友,还有孔子关于其他方面的论述,而本篇中,子贡关于“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即文质统一的论述,是值得注意的。总之,本篇内容亦涉及很多方面,全篇的中心应是孔子对“仁”和“政”的回答,但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关于本篇为何编于《先进》之后,皇侃、邢昺等先贤做了说明,但不能令人满意。如皇侃认为:“所以次前者,进业之冠,莫过颜渊。故《颜渊》次《先进》也。”这种说法几乎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先进”之名来源于“先进于礼乐,野人也”一句,“先进”二字并没有“道德学业为众人之先”的意思。邢昺认为:“此篇论仁政明达,君臣父子,辨惑折狱、君子文为,皆圣贤之格言,仕进之阶路,故次《先进》也。”这种认识稍强于前论,但亦非确论。这说明,篇次的安排也缺乏必然的联系,因而出现了众说纷纭的状况。

《子路第十三》,全篇30章。其中有16章,是其他人向孔子“问政”,孔

子作了回答。另外14章是孔子论仁、德、恭、忠、耻、信、中行、善人以及和与同等,最后两章论教民的重要性。因首章首句为“子路问政”,故以名之。邢昺以为:“此篇论善人君子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国修身之要,大意与前篇相类,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为次也。”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仍限于篇名的联系,而未能顾及全篇内涵的分析。而实际上由于每篇都是内容庞杂,所以无法找出篇与篇之间的内在联系。

《宪问第十四》,全篇44章。本篇记述孔子关于士人修德修身和出仕从政之道的论述,同时记述了孔子对若干人从政的评价,教导弟子学习他人从政的经验。本篇第12章(《论语》14·12)论述了士人在修身中如何做才能达到“成人”的问题。第42章,孔子回答了子路如何才能成为“君子”的问题,孔子认为,通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路径,就可以成为君子。这是整篇《论语》的中心思想,也是全书的内在逻辑,也是“仁”的基本内核。邢昺曰:“此篇论三王二霸之迹,诸侯大夫之行,为仁知耻、修己安民,皆政之大节也,故以类相聚,次于问政也。”所论内容大致如此,但本篇内部结构难尽如人意。

《卫灵公第十五》,全篇共42章。因首章首句为“卫灵公问陈于孔子”,故名。本篇有多方面的内容,首2章追述孔子周游列国在卫、在陈之事。以下用8章论述处世方法,用7章论述德行修养,用3章论述治国及君臣关系,用8章论述“仁”与“恕”,专论“君子”的有7章,论教育教学及言语的有6章,另有1章评论历史人物。其中有不少章节,亦非含义单纯,而是具有多重意义。前贤皇侃、邢昺等对本篇皆有评价,可惜疏漏太多,未明其义。而实际上,要在本篇找出一个中心,确非易事。

《季氏第十六》,全篇共14章。篇名取首章首句“季氏将伐颛臾”之前二字。其作“孔子曰”者有11章,这与前15篇中的“子曰”不同。另有未表明“子曰”或“孔子曰”的有2章,陈亢与伯鱼问答一章,从内容来看,也涉及治国、修德、交友、天命、教育等较多方面。其中首章载孔子“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名句。第2章载孔子关于“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的论述。因而本篇是表现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由于全篇涉及面广,故仍感论证中心不明确。

《阳货第十七》,全篇共26章。篇名取自首章首句“阳货欲见孔子”。阳货本为季氏家臣,此处取以为篇名,与其他各章内容无关。从内容来看,首章记述孔子关于学习与出仕的关系,以下有九章多多少少与此题有关。

以下有5章论君子小人的不同,有4章专论修德,有3章论述仁、孝,另有3章分别论述天道、礼乐和处世。总之,《阳货》篇,涉及内容亦较广泛。前贤皇侃、邢昺曾分析为何把《阳货》篇编次于《季氏》之后,但他们仅能就各篇首章而言,无法对全篇内容作出分析。

《微子第十八》,全篇共11章。因首章首句“微子去之”,故以名篇。本篇篇幅虽短,但也有五个层次:第一层即第1、2章记述殷末三仁及柳下惠事,表现了宁为玉碎的品格。第二层记述孔子不能在齐鲁二国行政的原因,即第3、4章。第三层是记述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接舆、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的几件事,即第5、6、7章。第四个层次是孔子对前代逸民的评价,并表达了自己努力与时俱进、无可无不可的应世态度,这就是第8、9、11章。最后一个层次是记述周公为儿子伯禽制定的用人政策,即第10章。全篇亦无明显的中心。

《子张第十九》,全篇25章。因首章首句为“子张曰”,故名。朱本曰:“此篇皆记弟子之言,而子夏为多,子贡次之。盖孔门自颜子以下,颖悟莫若子贡;自曾子以下,笃实无若子夏。故特记之详焉。”其中记述子张言论3章,主要是记述道德修养方面的事。子夏言论12章,其中涉及学习的即有3章,论述容貌举止的有1章,其余各章主要论述德行修养。子游言论3章,其中有2章是对子夏门人和子张的评议,另一章是关于“丧致乎哀而止”的论述。记曾子言论4章,1章是对子张的评议,2章是对孝的阐述,另1章表现了曾子爱民的思想。最后部分是记述子贡言论,共6章。其中1章是对商纣的客观评价,子贡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商纣翻案的人。另有4章是对孔子的评价,子贡认为孔子继承“文武之道”,是日月,是“不阶而升”的“天”,没有人能赶上或超过孔子。另有1章是子贡论“君子之过”。总之,本篇记述几位有影响的孔子弟子的言论,但弟子们各论其事,全篇没有形成一个中心。

《尧曰第二十》,共3章。本篇取名的方法与以上各篇相同。第1章的前3段是记述尧、舜、禹、汤和周初治国平天下的若干情况,第2段是孔子关于治国的若干主张。对本章历来有人认为语意不完整,可能有残缺。第2章是孔子回答子张“何如斯可以从政”的问题,孔子提出了“尊五美,屏四恶”的主张。第3章中,孔子提出了君子应该“知命,知礼,知言”的问题。作为《论语》的末篇末章,具有概括全篇的含义。本篇篇幅虽短但却是《论语》中少有的主题明确、论述集中、逻辑性强的篇章,全篇从总结历史经验,

分析现实需要和执政者个人素质三个方面,论述了从政治国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允执其中”和“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思想,在治国过程中,具有久远的思想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在通行的《论语》二十篇中的大部分篇章,内部逻辑性不强,每篇缺乏明确的中心,论述问题不够集中。只有少数篇章,有较强的逻辑性。

(二)

以上几点成为我们要重新编纂《论语》的基本理由。另一方面,《论语》二十篇的格局也不是从来就是如此的,即使是,也是可以更改的。

经专家研究,人们大体上可以了解今本《论语》的文本源流。曹魏时,何晏等人撰写《论语集解》,当时以汉代形成的《张侯论》为底本,以郑玄的《论语》为参校。而郑本出自《鲁论》《古论》《齐论》,篇章基本上从《鲁论》;《张侯论》亦出《鲁论》《齐论》,篇章亦从《鲁论》。但是,《鲁论》《齐论》是否就是最早的源头呢?

石永楦(1909—1975)先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作《论语正》(中华书局,2012年5月)一书,对《论语》的名称、文本变迁作出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

石先生首先引用王充《论衡·正说篇》说明问题。《论衡·正说篇》曰:“说《论语》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王充这一段话,可以告诉今人两个问题:一是《论语》篇数的变化;二是《论语》名称的变化。

关于篇数,孔门弟子所记孔子之言行,最初有“数十百篇”,但当时的篇幅皆较短,不像后来的“二十篇”格局,每篇那样长。而这数十百篇的区分

也不多么严格。正如石永楦所言：“本经最初之文，统首尾一篇而已。”^①后来为了阅读方便才有分篇。

分篇情况是：汉武帝时孔壁出古文二十一篇称《古论》，出《鲁论》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论》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还有河间本《论语》九篇，另一种版本三十篇。

后来，《鲁论》《齐论》及河间本皆不传，唯有古文二十一篇得以传播，昭帝女读时，尚为二十一篇，后经张禹、刘向、刘歆等人的整理，《论语》始形成二十篇的格局。

关于《论语》之名。《论语》一名的由来，班固《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汉书·艺文志》此说，影响较广。而《论衡》却称：《论语》初称为《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以书教授子弟时，始称为《论语》。

石永楦先生接受此说，经研究，又指出，在此之前，《论语》初称为《传》，后又直称为《孔子》，这与诸子百家的命名相同。后又简称为《论》或《语》，后逐渐定称为《论语》。

石永楦先生认为，今本《论语》二十篇的格局，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因而经过研究考证，呕心沥血，写成《论语正》一书。全书仿照《齐论》《鲁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知道篇”，下篇为“问王篇”（“知道”“问王”本为《齐论》的篇名）。上篇又分为五章，分别是：“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问王篇”，分为四章，分别是：“正名第六”，“士耻第七”，“绝四第八”，“问王第九”。这样原《论语》二十篇480余章的格局即被改纂为上下两篇，共九章的格局。每章之内，究竟辑录原二十篇的哪些篇章，石先生十分注重其内部的逻辑性，使每章内容尽力做到衔接自然，浑然一体。

对石永楦先生的改纂工作及当代专家的观点，我们无意评说是非，我们认为，这种状况只能说明《论语》的编纂状况不是从来就是二十篇的格局，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改变的。

对于《论语》的编纂结构，日本学者亦有所研究，如伊藤仁斋（1627—

^① 石永楦：《论语正·叙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页。

1705)把《论语》分为上、下论。他认为前后两卷体裁不同,是分前后两次编纂而成的。持类似意见的学者还有太宰春台(1680—1747),物徂徕(1666—1728)等。但这些学者都没有突破《论语》二十篇的编纂框架,只是在原框架内探索。

(三)

我们自幼诵读《论语》,大学毕业以后又从事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对于《论语》在编纂上的不足早有所体会,重编《论语》是我们久已产生的愿望,近来在师友的督促与指导下,我们决心把愿望变为行动。

本着按照《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本身的逻辑,并尽量与现当代人思维、语言习惯相衔接的原则,我们把原二十篇改变为五篇,即:

第一篇 修身论;第二篇 从政治国论;第三篇 教育教学论;第四篇 处世论;第五篇 道德与哲学。

第一篇修身论,分为10章,分别是:一、好学,志道;二、依仁,遵礼;三、躬行,辨惑;四、修德,游艺;五、孝悌,诚信;六、省己,交友;七、重名,求实;八、养生,生态;九、容貌,颜色,辞气;十、成人,君子。

第二篇 从政治国论,分为3章,分别是一、修身为国;二、从政治国方略;三、有道,无道。

第三篇 教育教学论,分为5章,分别是:一、资材类别;二、教育对象;三、教学内容;四、教学态度;五、教学方法;

第四篇 处世论,分为6章,分别是:一、敬天道,事鬼神;二、遵奉先王,效法先贤;三、知人论世,企望改良;四、修己安人,博施济众;五、处世良方;六、言貌,情感,气象。

第五篇 道德与哲学,分为12章,分别是一、仁论;二、义论;三、礼论;四、知(智)论;五、信论;六、忠论;七、直论;八、勇论;九、善论;十、耻论;十一、形实统一,质文并重;十二、折中适度,叩其两端。

每章之下,还根据内容,分为若干节,各节皆有标题。

我们认为把《论语》由二十篇的编纂格局改编为现在的五篇,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固有逻辑的。孔子作为一位政治家、哲学家,他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而“仁”又可拓展为“修己”“安人”两个相区别而又紧密联系的层面。“修己”层面就是后世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在《论语》原二十篇中,几

乎每篇都有“修身”的内容，“齐家”的内容虽少一些，但仍然体现了孔子重视“齐家”的思想。“安人”就是从政、治国、安民，其目标就是“天下有道”，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政”。因此，这次改编，设置了“修身论”和“从政治国论”两篇。孔子是一位哲学家，但他首先是注重现实、注重人事的政治家，所以，必须设置这一方面的篇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四处碰壁，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因而转而从事《诗》《书》《礼》《乐》的整理和人才的培育，同时这也是他传承薪火，继续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他从事教育教学数十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在教育教学规律的发现、把握，在教育哲学的创建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这一方面在原二十篇《论语》中，也有大量的记述。为了彰显孔子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故设立“教育教学论”篇目，以使今人从中得到启发、借鉴，以促进新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以上几项并不能包括孔子终生活动的全部，因而设置“处世论”篇目，把孔子除修身、齐家、从政治国和教育教学之外的言论全部囊括其中。人的一生有各种活动，但也可概括为一种，这就是为人处世，因此“处世论”，实际也可以包括以上各项活动，但为了突出孔子在各方面的贡献，还是缩小“处世”的范围，把它确定为本书的一个篇目吧。

根据《论语》和《孔子家语》等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孔子认为宇宙可分为天、人、鬼神等层次，而人又分为多种等次。据此，我们在“处世论”篇中，设置了相应篇目，以反映孔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天在孔子心目中，有两种品格，一方面是天道自然，“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另一方面是“天命可畏”，他继承了殷周以来的“天命观念”。

但孔子在“天”的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有为的态度，他以天道自任，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待天的运行变化。

在正确处理与天道鬼神有关的事物的同时，孔子注重人世间的事务，他效法先王，品评先贤，借鉴往昔，知人论世，修己安人，博施济众，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处世要方，特别是他注重把握时机，无可无不可的灵活态度，更令后人佩服。该篇对上述问题也都设置了相应的篇目。

在“处世论”全篇最后，还设置了“言貌、情感、气象”一章，这也是任何人在处世过程中必然遇到并需正确处理的问题，可惜这方面资料较少，不能令人满意。

在列置“修身”“从政治国”“教育教学”和“处世”诸篇之后，仍然感到